

包容性生态民主理论的新进展(上)

◎[英]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文

丁 晔译

[摘要]从主题上探讨包容性生态民主理论在1997-2007年间的新进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与包容性民主相关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论述由包容性民主计划所阐发的全球化理论,以及它与左翼的非系统的全球化阐释方法的不同;第三部分在说明旧的反体系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为什么日趋衰退或被吸纳进既存体系的同时,阐明包容性民主计划如何区别于其他激进的政治方案。包容性民主计划所设想的新型反体系运动,无论在总体目标还是具体手段上都与传统的反体系运动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它转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既然系统性的变革目标要求实现在制度和层面上与过去的断裂,就必须创建新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体系变革的新的全面的政治纲领,并同时在大规模民众层面上造就清晰的反体系意识。

[关键词]包容性民主;现代性;全球化;反体系(新社会)运动;绿色左翼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3-0105-18

[作者简介]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希腊籍英国自由政论作家,《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主编。

[译者简介]丁晔(1983-),女,天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社会运动与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09YJA710046)。

Title: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n the Inclusive Ecological Democracy Project(Part 1)

Author: Takis Fotopoulos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briefly the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n the ID project since ten years ago. The first part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ID.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the theory on globalization developed by the ID project and delineates it from the usual non-systemic globalization approaches of the Left. Finally, the third part attempts, on the one hand, to show why according to the ID approach both the old antisystemic movements (Marxism, anarchism) as well as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Green, feminism, etc.) are either in a stage of decline or simply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and, on the other, to briefly delineate ID from other radical project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ID transitional strategy is that, as systemic change requires a rupture with the past which extends to both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cultural level, such a ruptur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a new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program for systemic change that will create a clear anti-systemic consciousness at a massive scale.

Key words: inclusive democracy;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antisystemic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green-left

本文旨在简要阐明拙著《走向包容性民主》一书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多种语言之后包容性生态民主理论的新进展。在笔者看来,包容性民主计划并不只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成果,更是一种不断为动态理论所丰富着的广泛的政治选择,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大都已经刊登在关于包容性民主的国际理论刊物即《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其前身是《民主与自然》)上。笔者将这些新进展按主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与包容性民主相关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论述由包容性民主计划所阐发的全球化理论,以及它与左翼的非系统的全球化阐释方法的不同;第三部分在说明旧的反体系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为什么日趋衰退或被吸纳进既存体系的同时,阐明包容性民主计划如何区别于其他激进的政治方案。

一、与包容性民主相关的理论问题

(一)包容性民主的阶级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包容性民主阶级分析(Fotopoulos, 2000a)的出发点和社会主义计划有关。但是,由此而来的对“宏大叙事”的抛弃不应导致对所有阶级分析和政治的拒绝,或进一步说,不应放弃为人类解放而创设一个共同方案的必要尝试。当然,阶级划分的标准应当重新界定,以便超越关于它们的陈旧观念,即被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发展一种新的阶级模式,同时包容“差异”和“认同”政治,从而可以适合于一个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的时代。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工业时代导致失效的不仅是基于经济关系的特定类型的阶级社会观念,还包括所有由于阶级划分而带来的系统性社会分裂的观念。但事实表明,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政治幻想,甚或是对现存阶级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辩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的结论落脚于一个“后阶级”社会(也就是一个仅仅在获取经济资源、政治权力和特权等的途径方面存在着差别的社会)——既没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以

及其基础之上的“统治精英”,也没有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可以产生和复制它们,因而也就没必要发展一种解放政治或试图确定这种政治的主体。相应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拒绝所有作为元叙述的意识形态,并采取如下这种政治:它可以在实现不断平等与社会和谐的努力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上述“差异”。

后现代主义对今日阶级分析的有效性以及一个新的自由进步计划需要的摒弃态度,被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系统性批评所推进(Fotopoulos, 2001a)。那种主张先进的市场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或者是后现代转向)的观点遭到批评,并且被最近25年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以及理论层面所发生的变化证明是不合理的。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制度化了的主体政治和经济结构,不仅在北半球国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且现在也在全球层面上扩展。同时,其他层面的变化也只是表明或者业已存在趋势的延展,或者一些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理论和文化层面,往往反映的是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讲,后现代理论及其各种变体,在辩护自由主义民主的普遍性和当今经济与政治的市场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它扮演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主导性社会范式的角色,而且是与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相一致的。

总之,这种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改变决不能认为是体现了与过去的断裂,就像标志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化那样。相反,它只是表明,在19世纪自由主义现代性衰落和20世纪国家集权主义现代性失败后,先进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已经转入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模式,即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代表了以往的现代性模式的综合,并完成了一个以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化为核心的历史过程。目前,二者的制度化分别以市场经济的国际化 and 超国家的治理形式实现了普遍化。

十分明显的是,今天这种产生于现代并在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形式阶段迅速恶化的、长期的、多维度的危机,使一种新的综合变革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而这种方案计划代表了前现代和现代时期最好的传统——古典民主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绿党、女性主义与其他身份认同性运动中激进流派等的综合。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①,而这也正是包容性民主计划的目标。

(二)对新的解放性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需要

正如笔者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所表明的,科学主义与客观主义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阶段(或后现代主义者声称的后现代时代)遭遇了严重危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伦理(Fotopoulos, 2002),因为现代性早期阶段的伦理,无论是正统的还是解放性的^②,都是建立在客观主义尤其是科学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者最早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客观主义伦理所面临的危机,包括正统的和解放性的。因而毫不奇怪,后现代的道德研究方法经常被称为“道德者的终结”,取代了道德美学以及相应的“终极的解放”。

因此,尽管现代主义者认为可以建立一种非矛盾的、无冲突的伦理规范,因而在指导个人和集体道德时,普遍的理性可以取代普遍的宗教信仰,但后现代主义者拒绝任何一种解放计划,其根据是它必然成为普世性的。事实上,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对普世主义尤其是道德普世主义的拒绝,使得

他们的论点从解放的视角来看是尤其要反对的。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不只是批评可质疑的进步意识形态,而且进一步批判普世性的现代性方案以及关于市民与城邦的观念。

此外,关于当代社会并不以一种普遍道德为特征的后现代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普遍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主导性社会范式的普遍化。事实上,以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为基本表征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一普遍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之下,后现代主义者所称赞的道德多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伪多元主义,因为所有采用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在其核心价值上显示了基本的相似性:个人主义、消费者文化、他律道德(建立在宗教或其他某种唯灵论基础之上)。

因此,一个自治的解放性社会理应建立自己的道德规范,其中的核心价值必然与社会的基本制度保持一致,而非核心价值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世界范围的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是建立在表达个人和社会自治的不妥协要求的普世核心价值和赞美差异的各种非核心价值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的社会才可以保证和平与解放的共存。基于此,包容性民主计划认为,我们难以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规定一套完整道德规范,因为这很明显是未来的公民大会需要决定的事情。

然而,我们可以(事实上也应该)阐明,伦理是可以与一个民主社会的制度相容的。因此,首先,宗教伦理,或其他任何建立在非理性信仰体系基础上的道德伦理,是与民主社会完全不相容的,因为它与组织自身的民主原则不相容。其次,同样与这种民主伦理不相容的是唯心主义的永恒的、普世的价值观点,正如现在已十分清楚的,价值在不同的共同体和社会中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唯物主义的关于普遍价值(“客观”伦理)的观念,被假定来自于某种(社会的或自然

①尽管人们也许像卡斯托里亚蒂斯那样对于现代/后现代的分类提出严重质疑。参见 Castoriadis, C., *The retreat from autonomy: Postmodernism as generalised conformism*.

②解放性伦理在这里是指“反体系的”左翼激进理论家所提出的伦理学方法,旨在从一种激进的明确挑战建立在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视角评估现在和过去社会中的各种伦理学,并为未来解放社会提供一种规范性的伦理道德。

的)进化过程,也是与民主伦理不相容的。

然而,民主社会的计划不能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否认任何确定性,因而我们已经不可能依据与民主社会制度的根本相容性确定一套明确的原则来评价社会和政治变化,或者确定一系列伦理价值来评估人类行为。所以,问题在于,表明人类行为与民主制度相容性的那些价值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只能在体现出这种相容性的道德价值的意义上概括出民主理论的要意,其具体内容需要取决于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尤其是未来民主社会的公民大会来不断丰富。因此,假如一个民主社会是建立在包容性民主邦联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是以自治和共同体两项基本组织原则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体现这种相容性的一系列道德价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自治原则中得出一系列道德价值,比如平等和民主,对每位公民人格的尊重(不论性别、种族、种族认同等)以及对人类生活本身的尊重,同时也包括对每一个公民生活质量的保护——这必然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重新整合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共同体原则中得出一些价值观念,它们不仅涉及平等,而且包括团结和互助、利他主义或是自我牺牲(超越对亲属的关心和互惠)、关照与分享。但正如包容性民主计划所强调的,正是上述两个原则的结合构成一个包容性民主邦联的组织基础,并构成始终是解放性社会伦理一部分的道德原则。换句话说,只有自治和共同体原则的结合,才可以同时避免伦理“客观化”可能带来的基于共同体和谐理由的过度强制和无边界的道德相对主义可能带来的对政治和道德关切的一概否定。

公民教育(Fotopoulos,2003a;Sargis,2005;Gabbard et al,2005)肯定会在未来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内化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价值当然来自其基本的组织原则:自治原则和共同体原则。然而,制度本身不足以保证

不会出现非正规的精英,这正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民教育形式的教育的重要性所在。公民教育不仅是个人社会化,即个人将主导性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尤其是教育,在个人和集体价值构建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一个公共空间被掌握着政治、经济权力的各种精英占据的他律社会中,教育担负着双重目标:一是促进现有制度及其相应价值(主导性的社会范式)的内化,二是协助塑造“有效的”公民,他们积累了足够的“技术知识”,从而完全可以依据控制该社会的精英所制定的目标来行动。

然而,在一个政治可以从其古典意义上理解的自治社会里——即存在着一个直接民主的制度框架,人们不仅可以质疑法律,而且能够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我们所谈论的不再是教育,而是更宽泛的公民教育概念。它是一种更全面的公民化教育,包括培养性格、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艺的终身性过程,即实践一种积极参与性的公民权,其中政治不再被视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公民教育的双重目标,首先是指公民自我能动性的发展,即利用他们的自我能动性作为内化民主制度及其相适应的价值观的手段;其次是指培养负责的个人,同时内化法律的必要性和质疑法律的可能性,也就是能够质询、反思和审议的个体。

包容性民主的基本信条是:由于教育的含义是由主导性的政治来界定的,所以教育与政治有着内在性的关联。因此,除非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满足一系列制度性条件,尤其是教育自身的某些实质性变化(在教育中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免费的普遍而整体性的终生教育、个人与社会的自治、非等级制的关系、科学与美感的均衡等),否则,民主的公民教育就是不可能的。

(三)非理性主义、客观理性主义、系统论和复杂性

1. 非理性主义与包容性民主

民主的公民教育需要一种新的理性主义,超越我们从启蒙思想那里继承的“客观的”理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过于泛化的相对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民主理性主义,即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理性主义,作为社会自我制度化的结构与过程。在民主理性主义的背景下,民主不是凭借诉诸于自然或社会进化的客观趋势来辩护的,而是诉诸于一种可称为基于阐释与推理的理性,这种理性明确地拒绝任何关于社会变化的“方向性”的观念。

但正如笔者在他处阐明的(Fotopoulos, 1998a)^③,最近40年左右,在南北半球都出现了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④的盛行——从一些古老宗教派别的复活,到西方国家中各种威胁着传统宗教的非理性流派(神秘主义、唯灵论、占星术、新异教主义、“新时代”主义等)的扩展。区分理性意识形态和非理性信仰体系的标准是“真理”的来源。如果核心观点的真理来源是理性或“事实”——尽管也许很难采取严格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验证,那么它们就是理性的(可批驳的)意识形态。相反,如果核心观点的真理来自于非理性方法(上帝的启示、直觉等),那么它们就是非理性的(不可批驳的)信仰体系。当然,理性思维过程的标准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区分的现实含义在于,一种非理性的信仰体系,尽管可能对于那需要的人是有益的(出于心理的或社会的原因,或者仅仅

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死亡作为存在的最终结局的事实,以及个人的责任担当等),却不能成为任何对现实的理性解释的基础。对于一种对现实的理性阐释来说(当然总是基于特定的世界观视角),理性的意识形态是必需的。在笔者看来,导致这些“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的普遍化。失业率上升和低工资雇佣(作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出现的标志)带来的不确定性,与相伴发生的科学危机和随着消费社会产生而加剧的文化均质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结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一时期非理性主义的兴起。

二是不断扩展的各种非理性生态方法,不是将矛头对准作为生态危机根源的市场经济及其副产品增长经济,而是指向工业革命、进步以及理性本身。而对于包容性民主方法而言,经济的、政治的和更广泛的社会以及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并不是工业革命、技术、人口过剩、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等。在它看来,这些所谓的原因只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的具体表现,那就是“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因此,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当今时代的集中——前者是市场经济及其导致的增长经济兴起的后果,而后者是相伴随的“自由主义寡头制”兴起的后果(这是已故的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当代民主的描述),才是现存危机的终极原因。

三是“发展”在南方国家的失败。目前在伊斯兰世界盛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是南方国家特有的现象。在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类似的原教旨主义也在扩展,尽管原因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方的许多地方(例如拉丁美洲)甚至“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宗教复兴,尽管没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样极端化。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这是二次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引入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失败,以及相伴随的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所导致的文化均质化相结合所带来的后果。回归传统(尤其是宗教),对南方国家的贫

^③see also the exchange with Thomas Martin on the incompatibility of myths with ID in *Democracy & Nature*, vol. 8, no.1, 2002.

^④我们可以把非理性主义大致界定为其核心信念不是来自理性方法(例如诉诸理性和/或“事实”),而是直觉、本能、感觉、神秘体验、启示以及意志等信仰体系。因而,这些信念是完全处在理性话语之外的。这对于各种一直信奉某些非理性的核心真理(上帝、不朽灵魂、因果报应等)存在的宗教来说尤其如此,这些核心教条通常被记录在一些神圣文本之中,比如《约翰福音》《可兰经》和《吠陀经》等。

困人口来说看起来极具号召力,因为他们社会和经济的自主性被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所破坏。尤其是宗教被视为一种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道德规范,可以多少平衡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带来的不公正。同样,对唯灵论的回归被看做是唯一能与引入的物质主义相抗衡的方式,而后者是与一个无序的消费社会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即使在北方国家也不能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必需品。

2. 包容性民主与客观理性主义

包容性民主不仅从根本上与非理性主义是不相容的,而且与以封闭的思想体系为表现形式的客观理性主义也是不相容的。客观理性主义认为,基于“客观”的理性主义框架,特定“真理”来自理性方法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在社会或自然“规律”基础之上的关于社会进化的“客观真理”尤其如此。

这意味着,社会的民主制度中的主导性社会范式不仅不能建立在某些形式的非理性主义之上,而且也不能建立在任何形式的“客观”理性主义之上(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自然主义”等)^⑤。这是因为,无论是任何宗教或神秘主义的信仰体系,还是所有本质上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都拒绝质疑其某些核心信条或观念,因而是与那些制定自己的法律、发现关于他们自己社会的真理的公民不相容的。但是,民主与“客观”理性主义不相容的事实并不表明,我们只能诉诸于相对主义。民主与相对主义也不相容(在后者看来,所有传统包括自治和他律的传统,都只具有同等的真理价值)。

因此,民主只与一种形式的理性主义相容,那就是民主理性主义,即民主制下的理性主义作为社会自我制度化的结构和过程。这意味着,当一个邦联中的一些共同体相信“既定真理”(比如,真理或价值不是来自理性的民主商讨,而是来源于上帝或精神真理的“神圣”法律,甚至是从对社

会和/或自然进化的具体解读中得出的“规律”)的时候,这个包容性民主邦联是不可靠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要么是大多数公民都接受这样的原则,即每一个影响社会生活的决定,包括限制个人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都要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然后,每个人都要遵守相关的决定,无论这些决定与自己对基督、穆罕默德、佛陀或伏都巫师的信仰是否冲突,要么根本就谈不上民主。

3. 系统论与复杂性:一种激进的分析工具?

如果考虑到左翼认为在特定情况下系统论和复杂性可以成为对社会变迁进行激进分析的有效工具,上述关于民主与客观理性主义不相容的结论就变得尤为重要。^⑥上述左翼观点背后的逻辑依据是,我们可以把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解为超越后现代困境的一种尝试,从而表明元叙述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的终结。

但是,对这些声称的系统考察表明,根本性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所使用的概念。首先,复杂性概念,无论是简化的或辩证的,对于解释过去或预测未来的社会重大变化都没什么用处。即便我们承认动态物理系统的变化遵循力学的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原则上是可以发现的,但动态社会系统中的重大社会变化永远不可能遵循这种“可以发现的”规律。此外,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试图使用自然科学的工具来使社会分析“科学化”的努力(1995),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当然,除非这是指企图创造一种新的、被普遍认为由国际化市场经济创造的“无阶级”社会的认知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系统论就会变为统治精英用以保全自己特权地位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武器。

鉴于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卢曼和其他

^⑤对客观理性主义的批评,参见《关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争论》, *Democracy & Nature*, vol.6, no.1 (March 2000)。

^⑥参见《民主与自然》的“系统论与复杂性”专辑, *Democracy & Nature*, vol.6, no.3 (November 2000)。

系统论分析者使用的“无阶级差异社会”的概念,使系统论成为现实国际化市场经济中一个特别有用的新社会范式。在这样一个无差别社会里,我们被告知没有统治精英,或者“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我们通常使用的阶级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不仅如此,现实中也“不存在”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与此同时,各种形式权力的严重与不断增加的集中,似乎变得不再特别重要。相反,真正重要的是决策正由于其中涉及的不确定性而成为一种神话。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像功能主义和进化主义这样的社会系统理论——正像笔者在其他地方阐述的那样(Fotopoulos, 2000b),与包容性民主这样的解放性计划不相容?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三个原因:首先,历史进化主义的观点是与历史本身不相符的,尤其是涉及体制性变迁时。其次,任何类型的功能主义都是与历史中的想象力或创造元素不相容的。最后,功能主义用结构或价值取代了主体。

另外,在认识论层面上,社会系统论的问题也很明显。系统论与复杂性的支持者认为,该理论能够超越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分,却忽视了想象的重要性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特征的社会区分的重要性。这种“一元论”世界观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该理论支持者相信,我们可以在经济和社会的自然化归结过程中,借助自然科学的洞察力解释社会事实。对“无阶级差异社会”概念的使用特别适合于上述目的,因为很明显,这种假设在任何把自然与社会科学统一到一个“宏大的”自然理论框架之中的尝试都是必须的。

因此,系统论和复杂性能否成为对社会变迁作激进分析的潜在有用的工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是肯定性的,因为这会导致忽视分析工具与一种激进理论的内容之间始终存在的内在联系。在包容性民主计划看来,系统论和复杂性的确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范式而提出的,但这种新的

社会范式不过是服务于国际化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范式的替代物。的确,与从前的范式不同,这种新范式植根于一种新的“宏大”综合,因而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在我们所使用的自然科学一词的意义上)。因此,尽管系统论和复杂性在自然科学中是有用的分析工具,但在社会科学中它们就不那么管用了,甚至无论是从认识论角度还是就其内容来说,它们与那种旨在对走向包容性民主的体系性变化所作的激进分析是完全不相容的。

(四)包容性民主与科学技术

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今天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所需要的不是抛弃科学,更不是理性主义本身,而是要超越“客观”理性主义(指那种建立于自然或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这一看法对于技术科学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包容性民主理论看来(Fotopoulos, 1998b),现代技术科学不仅在它是一种可用于实现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一意义上不是中立的,而且在它作为决定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观念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意义上也不是自主的。相反,以增长经济及其主导性社会范式为特征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权力关系控制了技术科学。因此,一种民主的技术科学概念必须同时避免两种决定论:社会的决定论和技术的决定论。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动力方面,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尽管如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集权主义者还是环境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假定,从社会角度而言技术是中立的,我们只能将它用于正确的目的,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但明显的是,这种方法忽视了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制度背景以及如下事实,即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是与社会制度、尤其是生产制度直接相关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如同在任何社会中一样,技术包含着具体的生产关系。就市场经济而言,它的等级制组织结构,当然还有其首要目标,都是为了

使经济增长和利润收益最大化。因此,技术通常是为了最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的目标而设计的。

同样地,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技术科学,并不是一种自主的文化现象,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权力关系和主导性社会范式的副产品。在此意义上,技术科学不是像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及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1991:271)所认为的是自主的。在他们看来,现有的增长和发展是与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相矛盾的,尤其是正在发生的对环境的破坏。卡斯托里亚迪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技术是不可控的、无方向的和无目的的。在包容性民主理论看来,我们只有从长期视角来考察技术时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即使从中短期角度来看,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制度所控制的,这些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以及内含的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所以,即便从较长期角度看技术显示出无方向性,甚至与体系自身的目标相矛盾,那也是由于对于那些试图控制技术选择的长远影响的人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本身的逻辑。尽管技术选择看似是非理性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那些主宰着市场经济的价值与目标一致的,因而是理性的。此外,正是由于新兴的“绿色”技术既就生态含义而言满足了现行体制的长期需要,又与其追求效率、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符合,所以它们才被部分采用。而正是这些绿色技术(例如“绿色”冰箱)的部分采用,造就了环境主义者的神话即一种“绿色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如下一种方式对科学与技术进行重构,即在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在每一项技术之中,都把人类的个性及需求而不是目前那些控制着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的人的价值观和需求置于中心位置。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其中,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公

民有效地控制所使用技术的类型,所体现的是整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部分人的利益。为此,我们就需要如下的制度性前提:

一是政治民主,由此才能建立起公民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有效控制。

二是经济民主,由此才能保证各个邦联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经济精英的局部利益)在研究与技术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

三是生态民主,由此才能确保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中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的考虑。

四是社会领域的民主,即人们在工厂、办公室、家庭和实验室等享有平等的决策权,相应地,生产、科研和技术发展中等级制的废除才能不仅保证科学与技术的民主成分,而且保证科学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民主程序以及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其的共同控制。

但必须清楚的是,科学与技术的民主化不当与废除劳动分工和技术专业化的空想相联系。例如,托马斯·西蒙(Thomas Simon)就认为,技术民主化“这一过程的现实进展,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需要专业人员和专家,相应地,我们可以将这一专业领域变为一个民主审议大会”(1990:112)。虽然现在极端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由于对“效率”追求的需要,而这又是增长经济动力学的必然结果,但是,部分缘于必要性的专业化分工的减少存在着客观性的限制,如果我们不希望看见早已得到解决的诸多难题再现的话(比如医疗问题、卫生问题等)。

一个民主社会所采纳的技术的性质不仅仅取决于谁拥有它,甚或谁控制它。历史表明,不仅“社会主义的”官僚可能像资本主义的官僚一样采用破坏环境、毁坏生活的技术(即便不会更加严重的话),而且市民大会使用同样技术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对技术的寡头所有制和控制的废除——这只会在一个基于包容性民主的,没有市场、货币和国家的经济体里才会产生,是替代性技

术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制度条件,更充分的条件取决于一个民主社会所发展出的价值体系及其公民的觉悟水平。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制度框架的变化和民主的公民教育相结合,在这种新的价值观形成和政治觉悟水平提高过程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技术科学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这样一个过程与当前流行的现代信息技术允诺的便捷“获取信息”没有任何联系。对那些强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人来说,这甚至意味着,民主的技术工具和民主社会的形成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但正如笔者在他处所试图证明的^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民主社会和民主的科学技术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这是当然的),而在于在现存制度框架下能否形成一种民主的科学和技术(这是充满疑问的)。在笔者看来,一种民主的科学和技术在政治、经济权力不断集中的现行制度框架下是无法形成的。

二、包容性民主的全球化观及其多重危机理论

(一)包容性民主的全球化观、《帝国》与改良主义左翼

左翼对于全球化理论分析的主要分歧——包括在反全球化运动内部——基于一个关键问题,即目前的全球化(被普遍认为导致了日益加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生态灾难性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是不是可逆转的。改良主义的左翼对此持一种肯定的回答,而包容性民主理论则认为,这种全球化的消除只能寄希望于一种新的大众反体系运动的发展,并开始于“自下而上”的民主的全球化的新形式(Fotopoulos, 2001b)。

1. 系统性的方法

^⑦参见笔者参与的关于“科学、技术与民主”的学术对话, *Democracy & Nature*, vol.6, no.1 (March 20000).

包容性民主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方法论起点,是它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之间所作出的区分。在它看来,目前的这个过程也许应该更严格地称之为“国际化”,因为其迄今为止并没有满足适当全球化的生产要求。然而,“全球化”这一术语虽然不准确,却已被广泛接受,所以笔者在此沿用这一术语。

在包容性民主方法看来,对于经济全球化性质的混乱源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不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的”特质的现象这一关键问题上,不同的理论方法给出了相互冲突的答案。如果我们将这种全球化视为一种“系统性的”现象,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它看做是经济政策内源性变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是不可逆转的。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在此把所有用诉诸于社会经济体系的结构特征来阐释全球化的方法称为“系统性的”。

依此为标准,关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方法,比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的方法,应该被视为“系统性的”。因为,他们将全球化看做主要是由于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变化所带来的现象。但正如前文所看到的,技术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自主的。所以,当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者将现有技术视为理所当然,视为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可逆转的存在时,他们是在含蓄地把全球化归因于“系统性的”因素,相应地,他们也把全球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逆转的。

同样地,包容性民主方法明确地认为是市场经济增长或死亡的动力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也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在包容性民主方法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在国际化市场经济体系下,没有保护劳工和环境的对市场的有效控制是可行的。但是,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的和包容性民主的方法尽

管都是系统的方法,但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方法将现存市场经济视为应当,而包容性民主方法却并非如此。因此,前者是在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接受当前的全球化,而后者却在致力于寻求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蕴涵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在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家集权主义“民主”下是不能实现的。

2. 改良主义左翼的非系统方法

如果我们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视为一种“非系统的”现象,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它看做经济政策外源性变化的结果。相应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一种可以逆转的发展。因此,笔者把那些借助各种外源性因素即不是直接与市场经济的结构特征及其动力学相联系来解释全球化的方法称之为“非系统的”方法。在这种方法看来,全球化最终不过是一种神话或者意识形态。

基于此,改良主义左翼所主张的方法可以归入研究全球化的“非系统的”方法。例如,部分左翼人士将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视为理所当然,其支持者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约翰·格雷(John Gray)、利奥·潘尼奇(Leo Panitch)、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以及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尽管这些方法通常假定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开端于资本主义产生之时——这一假设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他们承认导致全球化这一趋势的系统性特征,他们实际上将其归因为明显的非系统性特征。

用于克服这一明显矛盾的论点是把资本主义体系视为从来就是全球化的,新近发生的变化只是全球化的形式而已。然而,这一全球化形式的变化并不被认为是系统性动力的结果,而是认为是伴随着右翼和/或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既存的社会主义”失败后左翼遭遇的历史性挫折,以

及社会主义民主的恶化等一系列非系统性的或外源性发展的共同结果。因此,在这种无望的、矛盾的观点的基础上,改良主义左翼将全球化视为可逆转的和可以进行实质性改变的,前提是有足够的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政治经济精英引入有效措施来保护劳工和环境。

3. 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

当然,在系统性的与非系统性的方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中间性的方法,其特征是系统和非系统性因素的混合,以及与改良主义左翼方法所不同的分析性差别。

比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donio Negri)——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采用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资本主义密谋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由于面临“通过社会和政治的辩证法掌控它与劳工之间冲突关系能力”的危机,资本诉诸于对劳工的双重打击:首先是直接指向社团主义和劳资双方谈判,其次是通过自动化和计算机化重组生产过程,从而在事实上将劳工排除于生产之外。

哈特和奈格里的假设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正如他们在其畅销书(Hardt et al, 2001; 1994)^⑧中所强调的,这一“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斗争的不断累积所推动的,而后者也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发动机”,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客观地和不可避免地循环的结果。哈特和奈格里得出的结论,即《帝国》的主要观点是:当代的全球化(他们称之为“帝国”)没有权力的地域中心,也没有固定的边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的、去领域化的统治机器,凭借它开放性的、不断扩展的边界逐渐囊括全

^⑧对于该书的包容性民主视角下的评论,参见Takis Fotopoulos, “Hardt and Negri’s empire: A new Communist Manifesto or a reformist welcome to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 Nature*, vol.8, no.2 (July 2002).

球。基于此,人们应该欢迎它的到来,因为它是资本对反叛性主体力量的最新让步,并蕴涵着一种替代性的(共产主义的)全球化的萌芽。他们认为,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拒绝这些过程,而是将其重组并导向新的目的。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一分析的有趣之处是建立在对福利国家的性质(认为福利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阶段依然存在,却忽视了它正在被一种“安全网”所取代的事实)的无根据断言和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自相矛盾且混乱的分析基础之上的,以改良主义的要求和对未来社会的模糊憧憬而告终。

然而,即便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声称,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不是一种阴谋,也不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不可逆转的,仍然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意,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目前的全球化应当予以欢迎,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性全球化得以开展的“客观”基础——这令人想起人类进步过程所导致的所谓“必要的恶”的“客观主义”分析。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不存在什么“必然性”,因为它只是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所施加的最初决定(即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一体制之内的斗争(就像国家集权主义现代性时期那样)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这一过程,除非斗争的结果是这一体制的废除。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绝不可能成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基础”,走向这样一种社会的运动只能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而不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离这样一个社会的客观基础还很遥远。

(二)政治全球化、跨国精英及其“战争”

然而,全球化不能只从贸易、投资和交通角度来理解,它还有政治的和安全的维度——这在过去是国内精英的领地,而今则是跨国精英的范围。很明显,一种跨国的经济需要相应的跨国精英。这种精英的出现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和包容性民主理

论所阐明,而且相关证据也进一步表明了这点。

跨国精英指的是这样的精英,他们通过在跨国层面的运作获取权力(经济的、政治的或者社会整体意义上的权力)。跨国精英包括公司经理、大股东、执行官、全球化的官僚以及职业政治家等——他们或在大型国际组织中,或在主要市场经济体的国家机器中发挥作用,还包括各种国际基金会中重要的学者和研究者、智库成员、国际知名大学研究部门的成员,以及跨国大众媒体的执行官等。新兴跨国精英在国际市场而非国内市场中寻求利益,是一个无权力地域中心的统治机器,而不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由于他们广泛的经济、政治或社会权力,其成员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与国内精英不同,他们并不认为保障其在社会中特权地位的最好方式是确保任何真实的或想象的民族国家的不断复制,相反,认为是新世界秩序得以建立的制度框架的世界范围内复制。换句话说,世界新秩序是建立于前苏联解体之后,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现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普遍化。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而不是制度化的精英。相应地,在这些经济精英成员的掌控之下,经济全球化表现出的是非正式的经济权力集中;在政治精英成员的掌控之下,政治全球化表现出的是政治权力的非正式集中。换句话说,经济精英构成了跨国精英中控制着国际化市场经济的那一部分,而政治精英则构成了跨国精英中控制着世界新秩序的政治军事维度的那一部分。在跨国精英掌控下的保证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的主要机制分别是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而跨国精英得以实施其非正式控制的主要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八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以及联合国等。

迄今为止,跨国精英所发动的“战争”[例如,以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而告终的海湾战争(Fotopoulos, 2003b)、科索沃战争(Fotopoulos, 2002c)

以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 (Fotopoulos, 2002d)]证明了一种跨国治理的非正式体系和跨国精英所主导的政治全球化的存在。全球化的非正式性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保持一个运行良好的代议制“民主”的表象(其中地方精英依然可以作出重要决策),而且是为了保留民族国家对内的暴力垄断。后者的必要性在于,地方精英可以依此控制其民众,尤其是劳工运动,以确保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

跨国精英所发动的所有战争都具有某些重要的共同特征。比如:

第一,所谓的“战争”是由跨国精英的最高层决定的,他们掌控着必需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尽管参与“战争”的政体都号称是“民主的”,它们的人民从不直接参与决策,在各国议会中,职业政治家往往是在战争发动后才被召集起来批准“战争”的。

第二,战争无一例外地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法,不管是在由资本主义所控制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掩盖之下发动的(如海湾战争),还是没有这种掩饰的(如南联盟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用于辩护这些战争的“有限主权”教条是与联合国宪章明显冲突的。

第三,在这四场“战争”中形成的、跨国精英成员之间的军事分工模式包括:在战争初期对美国军事装备的大量使用,尤其是其无可匹敌的空军,以及在战争后期出于维和等需要,对其他成员国军事力量的动用。

第四,任何协商解决方案都被跨国精英排除在外,要么它们开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要么就是以攻击为威胁,完全拒绝该国提出的协商解决方案。前者如南联盟战争,根据朗布依埃决议,南联盟应自动转为北约的被保护国以避免遭到进攻;后者如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或者阿富汗。

第五,“战争”的政治军事目标是摧毁目标国

的基础设施,恐吓其人民(在“间接伤害”过程中杀害成千上万的无辜公民),以使它们“软化”,友好地接受跨国精英。相应地,一个主要目的是使跨国精英在摧毁蓬勃发展的反战运动上的损失最小化,以免像在越南发生的那样阻止美国精英的战争。

很显然,包容性民主关于跨国精英的“战争”、包括“反恐怖主义战争”的观点与现存体系理论家所主张的“文明的冲突”(Huntington, 1997)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而且不同于改良主义左翼所赞同的“原教旨主义的冲突”(Ali, 2003)。根据后一观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西方和东方的“极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即华盛顿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原教旨主义与极端伊斯兰主义者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然而,正如笔者在他处阐明的(Fotopoulos, 2005a),这些观点不仅是完全错误的和误导性的,构成了由中左和改良主义左翼所支持的“进步”自由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与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反体系理论立场没有任何联系。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现在的社会抗争运动应该反对这两种原教旨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本身及作为其政治补充的代议制“民主”。因此,改良主义左翼的理论家[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一种毫无根据的结论而告终,即在2004年选举中,左派必须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忘记”当“进步的”克林顿作为跨国精英的代表接替老布什后,继续轰炸南联盟,并通过近乎谋杀的武器禁运以及长途空中轰炸来为进攻和占领伊拉克作准备。

(三)意识形态全球化与大众传媒

经济与政治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这种国际化的意识形态赋予经济与政治全球化以合法性。换句话说,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最小化的辩护,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意味着市场和私人资本作用的扩大,另

一方面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减弱,这是对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导致的经济主权减少的补充。因此,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核心包含两个基本的“教条”:有限的经济主权和有限的国家主权。

根据前一教条,由国际经济组织施加给其成员国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迫使它们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的“自由化”),据说是会惠及所有成员的,因为它会带来更有效的增长、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等。但是,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市场“自由化”同时还意味着以大多数人为代价换取更多的经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收入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从而威胁世界几十亿人口的(即使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经济上的)生存。然而,这仅仅被视为全球化的“附带性破坏后果”。

同样地,依据后一教条,世界上存在着一些超越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普遍价值。在跨国精英看来,当像“民主”这样的普世价值被违背时,体现国际社会意愿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等),或者如有必要的话,由美国精英所带领的跨国精英自身,应当借助任何手段来保护与推广它,而不必考虑国家主权。这一新兴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有限”主权教条,用于“辩护”对任何“流氓”国家或政治组织和运动的军事干涉或进攻。按照这一教条,应当有一些普世价值高于像国家主权这样的其他价值。结果,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无限主权原则在世界新秩序中被完全打破了。

如上所述,由中左和主流绿党推波助澜的新国际意识形态在为跨国精英借助有限主权教条发动的“战争”的“辩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左及主流绿党都已经在经济、政治方面完全接纳了世界新秩序这一事实来解释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欧洲主要中左政党都已经接纳了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样,主流绿党很早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关于激进经济变革的任何想法,而采取了一种“生态社会自由主义”,或者某种版本

的“绿色资本主义”。因此,中左分子热情地支持跨国精英的那四场“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主流绿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关注海湾战争的生态影响,随后就成为南联盟战争的热情支持者,今天则已完全支持“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了。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无论是通过缩小精英罪行的重要性还是将事件从历史背景中截取加以歪曲,在操纵大众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大众媒体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提供主观条件方面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当然不足为奇(Fotopoulos, 1999a)。这主要是通过直接推动新自由主义议程来实现的:一是通过贬低国家的经济作用;二是通过对国家“依赖性”的意识形态批评,认为那是由福利国家带来的后果;三是通过将自由等同于自由选择权,而后者将主要由市场自由化来实现。

同时,制度层面上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也为大众传媒发挥上述作用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是因为,市场的去规制化和自由化,以及欧洲许多国家国家电视台的私有化,都通过内外竞争压力创造了均质化的条件。并非偶然的是,重要的传媒巨头,像美国的默多克、德国的克什、意大利的贝鲁斯可尼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程的主要鼓吹者。

(四)文化全球化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确立意味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沦落。这一过程在20世纪由于扩展到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及其所带来的增长经济而加剧,导致了今天所出现的文化严重均质化的现象。它不仅排除了任何趋向复杂性的方向感,而且事实上使文化变得简单化,城市间越来越相似,全世界的人都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肥皂剧,买同样品牌的消费品等。

最近20年左右,在社会民主共识坍塌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文化均质化的过程,这是市场自由化和去规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急剧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传统社

区及其文化在全世界都消失了,人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所制造的大众文化的消费者。

因此,最近在世界各地都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体现了面对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均质化而作出的保持文化认同的最后努力。但是,在电子化环境中,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完全没有任何真实的含义,因为国际交往信息量的75%掌控在少数跨国公司手中。换句话说,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要兼并和吸纳不同的文化,无需使用过去的坚船利炮。信息沟通的市场化已经为文化多样性沦为一种类似于民俗性的表面化区别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这也表明,今天那些主张自治是保持其文化身份的最佳途径的西欧“身份认同运动”(从佛兰德到伦巴第,从苏格兰到加泰罗尼亚),实际上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个人和社会自治的要求。这种扭曲来源于如下事实,即社会的市场化已经侵蚀了像互惠、团结和互助这样的社区价值观的基础,而代之以鼓吹竞争和个人主义的市场价值观。由此导致今天对文化自治的要求不是建立在促进与其他文化共同体合作的共同体价值观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鼓励竞争与冲突的市场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基于这种关联,欧洲目前新种族主义的兴起是直接随着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兴起而产生的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和贫困,以及新自由主义对共同体价值观基础的侵蚀相联系的。

最后,我们也不能低估文化均质化和商业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传统好莱坞电影中所展示的逃避性角色今天已遍及全球,其主要途径是电视剧文化在大众中的扩展,以及好莱坞亚文化几近完全的垄断。在尼日利亚、印度、中国或俄罗斯,每一个电视观众都梦想着电视剧中所看到的美国式生活,并接受其中所蕴含的竞争性价值观来思考。证据表明,超乎我们想象的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或许更多与这种文化现象相关联。当各种电视纪录片播放时,尤其是那些东欧国家的人们,会认

为自己与西方电视里所界定的“正常”状态相比,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事实上,许多参加游行示威并要推翻本国政权的民众通常是将这种“非正常性”作为其主要政治行动的激励。

依此,人们可以批评一些左翼人士所赞成的文化相对主义。依据后者的观点,几乎所有的文化偏好都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因此鉴于各自所处的限制性条件,所有的文化选择都应受到尊重,如果不是羡慕的话。但明显的是,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文化选择是不是理性的,也不在于“客观地”评估我们的文化偏好是对还是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我们的价值观选择和我们所希望生活与其中的社会相容,然后使我们的文化选择与这些价值观相容。这是因为,走向基于替代性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未来社会需要这样的前提条件,而且创造一种替代性文化的努力现在就应开始,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与新价值观相容的新制度。

基于文化选择和一个真正民主社会的价值观之间的一致性准则,我们可以阐明一种超越后现代相对主义并区分“值得喜好的”与“不值得喜好的”文化偏好的方法。所有那些电影、录像、话剧等涉及的文化选择,如果会促动市场经济价值观,尤其是对金钱的竞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贪婪以及暴力、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就是“不值得喜好的”;相反,如果有助于促进互助、团结、分享和平等(人种、性别、种族等之间)等共同体价值观,就是“值得喜好的”。

(五)全球化与多维度危机

在《走向包容性民主》出版10年之后,世界多重性危机在其所有主要方面都明显加剧了。

1. 经济维度

作为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增长抑或死亡的动力学结果的经济权力集中,导致了世界长期的经济危机,这可以被持续且急剧增加的收入或财富差距所证明。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南方与北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世界每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其他

群体与经济精英和社会特权集团之间。事实上,即便是世界银行及其他组织玩弄数字把戏试图证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世界贫困大幅度减少,也难以掩盖如下事实,即南北半球国家之间及其自身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是不断扩大的。

迄今,尤其是北方国家,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那次危机就是由于市场经济国际化和国家集权主义的扩展而导致的根本性矛盾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大量兴起的跨国精英,开始着手减弱国家的经济作用来解放和解控市场,这一过程已经给北半球国家的大多数人口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这种国家集权主义的急剧减少将历史时钟倒拨到了利用混合经济和凯恩斯主义政策创造“人性的资本主义”之前的时期,其结果就是导致了最初的显性失业的急剧攀升以及今天大众性的低薪就业,这都应归因于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和政治精英决意要减少显性失业的努力,因为后者带来了高政治成本以及无信誉的市场或增长经济。

这在拥有最典型的“新经济”的美国,以及在过去约30年中都是由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政府连续执政的英国尤为明显。这一经验已在北方所有国家得以复制,尤其是在德国的莱茵“社会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失败以及欧盟国家通过一系列条约引入类似的政策之后。我们可以预言,在“弹性”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两大主要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的国家和中国、日本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印度的激烈竞争,将导致更多低薪就业而不是显性失业。史蒂夫·弗利特伍德(Steve Fleetwood)指出:“英国的弹性制度导致的是低劣工作,也许甚至是一种新的失业……英国并没有解决失业问题,而是将它转化为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就业质量的低下。”(1999)同时,在南方国家出现了一种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社会特权集团(这是由于他们在本地新兴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

这一分工已成为国际分工必需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群体之间更严重的集中,这在创造了新的增长“奇迹”的中国和印度尤为明显,因为那里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

很明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因素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即市场经济缺乏创造一个经济上平等的世界的内在能力。也就是说,正是市场经济动力本身和国家对这一动力的支持(Fotopoulos, 2005b: chapter 1),导致了单个国家中经济权力的集中以及以国际层面上经济权力的严重集中为特征的国际市场经济,这一权力主要集中在大型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跨国精英手中。因此,在最近约25年中,由于跨国公司的大量扩展而带来的市场的开放,使现在以新自由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的结果成为必然,结果形成日趋两极化的世界。其中,一个世界包括由全球化所产生的、在南北半球都存在的社会特权集团,另一个世界是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据说应带来的“普遍”利益之外的,主要指南北半球被边缘化的大部分人口。

市场经济固有的能力缺陷及其政治补充(代议制“民主”只能造成一个经济平等的世界),是如下事实的直接结果,即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相应的全世界的的不平等不只是结果,还是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天然性的屏障使在北半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高消费标准的普遍化不可能实现。

2. 政治维度

政治权力集中于政治精英手中的类似过程也在同一时期发生。18世纪最后25年,美国的立宪开国之父们开创了代议制“民主”,这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前所未有的想法,因为在当时民主是指古希腊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即所有公民直接参与行使权利。

正是代议制“民主”的内在动力,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在现代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市场

经济动力和代议制“民主”动力相结合,使政治转变为一种治国技巧,由智库来制定及执行政策。结果,围绕首相(或总统)的一个小派系掌握了所有重要的政治权力,尤其在主要市场经济体中这一小派系构成了跨国精英的重要部分,而在那些两党制国家中更是如此。此外,随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不断下降,公共领域正转变为纯粹的行政领域。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中央银行,它掌控着欧元,能够不受政治干扰地制定关乎数亿人口经济生活的关键性政策。

因此,在现代新自由主义国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危机”,削弱着代议制“民主”的基础,这集中表现为公众开始以明确或不明确的方式质疑主要的政治制度(政党、竞选等),具体表现为选举竞争中严重的且不断上升的弃权率(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经常发生的暴力骚乱、党员人数的不断减少以及由于近期发生在欧美诸国的金融丑闻导致的职业政治家信誉的进一步降低等等。公众日益确信的是,对于大多数政治家(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用来挣钱并巩固其社会地位而已。

在现行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框架下,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过去左与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消失了。选举成为魅力型领导人及其背后的政党机器之间的选美比赛,他们虽然相互攻击以吸引选民的支持,却是为了实施同一主题的不同形式的政策:以牺牲福利国家和国家对充分就业的承诺为代价使市场力量的自由最大化。结果,抗拒这一过程的局部性区域已经迅速消失:从德国到现在的法国,在萨科奇竞选获胜之后,法国也走着同样的道路。一家德国研究机构公开宣称:“欧洲的福利制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生存。让政治家们懂得这一点也许要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但他们最终会明白的,逆历史潮流无路可走。”(Fotopoulos,2001b)

因此,对政治与日俱增的冷漠总体上说反映

的并不是由于消费主义而导致的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冷漠,而是社会弱势群体对传统政党及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日渐失去了信心。竞选中的高弃权率出现在低收入群体中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看不出左与右之间(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政党之间)还有什么重大分别。

尽管如此,西雅图、热那亚、巴黎和雅典等地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清晰地表明,现在的青年不是对政治本身(在该术语的自我管理的古典意义上)冷漠,而只是不满于今天所发生的政治,即这个允许社会少数人(职业政治家)决定每个公民生活质量的体制。换句话说,正是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职业政治家和各种“专家”手中,使政治转变为治国技巧,并将大多数人排除在了这种“政治”之外。

3. 社会维度

增长经济创造了增长社会,其主要特征是消费主义、私人化、异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碎片化。增长型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非社会”,即原子家庭和个人取代社会。市场经济以现行的国际化形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并加剧了社会危机。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传统价值观的最大敌人。因此,社会危机正是在那些市场化充分发展的国家更为显著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为如下事实所证明,即无论是“回归经典”的运动(英国),还是宗教、神秘主义及类似思潮的强化(美国),都没有对社会危机最显著的特征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犯罪激增、吸毒泛滥已使得许多国家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反毒品战争”(Fotopoulos,2007a;1999b)。

比如,在英国,从1950年的100万起犯罪事件加倍至1979年的220万起,经过了30年。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犯罪率以高于加倍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增至500万,而今天已经接近600万。精英们应对犯罪激增的措施就是修建新监狱。所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人口从90年代初的64000人增加至几年前的77000人,而英国移民局最近的预测显示,到2010年监狱人

口会增至 90000 人(Jones, 2005)。同样地,美国的监狱人口增至 100 万经过了 200 年的时间,但在最近的 10 年里却增至将近 200 万,即每 10 万人中就有 680 个在坐牢——占据了世界总监狱人口的 1/4。

所以,经济市场化所导致的经济权力的集中,不仅增加了少数特权群体的经济特权,也增加了其不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新的上层阶级将自己孤立奢华的贫民窟中。同时,市场化尤其是弹性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就业的不安全性——这是在今天影响除极少数上层人外所有人的现象。正如国际劳动组织 2000 年报告表明的,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的紧张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就是由于弹性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它增加了雇主对更高的劳动效率需求的压力。

4. 生态维度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是危机的生态维度,这是目前危机趋于恶化的最明显例证。生态体系的紊乱、不断膨胀的人口、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可再生资源所面临的威胁……环境和人类生活质量的迅速恶化,使得过去 30 年中经济增长的生态副恶果异常明显。但是,温室效应及其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地体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事实上,正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出版的报告,终于把生态危机推向了全球头版新闻的位置。鉴于如下事实,即使我们能够采取最佳应对方案(即在本世纪内将温度上升控制在 2.2 摄氏度),据欧盟委员会称,欧洲将会有 11000 人在未来 10 年内死去,从 2071 年开始,仅南欧 1 年就会有 29000 新增死亡人数,超过北欧的 27000 人,由温室效应导致的威胁着人类生存的灾难性气候变化已非常明显。但事实上,这一报告只是用无可争辩的证据证实了反体系的左翼和生态学家所作的最坏的预测,而这些人至今还被精英们和改良主义者视为“危言耸听者”不予理会。

然而,精英们尽管不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框架下采取任何有效的减缓措施,却在通过其控制的大众传媒使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神秘化。参与这一神话的不断复制的,不但包括政治和经济精英,还包括左翼中的改良主义者和绿色分子——他们宣称“危机源于所有人”(政府以及市民社会)(Fotopoulos, 2007b)。因此,根据这一体系自身复制的神话,“人类活动”或一般意义上的“人”应该为温室效应负责。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生态危机并不是由整体性的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最近 200 年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还有人认为,工业革命以及工业文明和价值观,比如我们所说的增长经济,应为现在的危机负责。但可以证明的是,增长经济的兴起不只是价值观、意象和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还是一种具体的经济体制的动力与社会斗争的结果相互作用的产物。

基于上述神话——其共同特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体系及其伴生物增长经济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声称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这些建议的共同之处在于,只要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采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全球公民社会改变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生态危机就可以克服。

但事实上,导致温室效应的根本原因正是增长经济所蕴含的生活方式,而增长经济又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尤其体现为收入和财富集中于某些国家之间或国家之内,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财富聚集、汽车文化等。可是,生活方式是不会由于精英的告诫和摇滚音乐会而改变的,因为它正是以造成生态危机的制度框架为条件的,即导致各个层面集中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及其政治补充。[本文原刊于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vol.3, no.4 (October 2007). 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和原发刊物授权本刊。待续。]

[参考文献]

- Ali, T., 2003. *The Clash of Fundamentalisms*. London: Verso.
- Castoriadis, C., 1991.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etwood, S., 1999. Less unemployment, but more bad employment. *The Guardian*, 13.
- Fotopoulos, T., 1998a. The rise of new irrationalism and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Inclusive Democracy. *Democracy & Nature*, 4(2-3).
- Fotopoulos, T., 1998b. Towards a democratic conce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cracy & Nature*, 4(1).
- Fotopoulos, T., 1999a. Mass media, culture and democracy. *Democracy & Nature*, 5(1).
- Fotopoulos, T., 1999b. *Drugs: Beyond Pen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in Greek)*. Athens: Eleftheros Typos.
- Fotopoulos, T., 2000a. Class divisions today – the Inclusive Democracy approach. *Democracy & Nature*, 6(2).
- Fotopoulos, T., 2000b. Systems theory and complexity: A potential tool for radical analysis or the emerging social paradigm for the internationalised market economy. *Democracy & Nature*, 6(3).
- Fotopoulos, T., 2001a. The myth of post modernity. *Democracy & Nature*, 7(1).
- Fotopoulos, T., 2001b. Globalisation, the reformist Left and the 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 *Democracy & Nature*, 7(2).
- Fotopoulos, T., 2002a. Towards a democratic liberatory ethics. *Democracy & Nature*, 8(3).
- Fotopoulos, T., 2002b. Hardt and Negri's empire: A new Communist Manifesto or a reformist welcome to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 Nature*, 8(2).
- Fotopoulos, T., 2002c. New World Order and NATO's war against Yugoslavia. *New Political Science*, 24(1).
- Fotopoulos, T., 2002d. The global "war" of the transnational elite. *Democracy & Nature*, 8(2).
- Fotopoulos, T., 2003a. From (mis)education to Paideia. *Democracy & Nature*, 9(1).
- Fotopoulos, T., 2003b. Iraq: The new criminal "war" of the transnational elite. *Democracy & Nature*, 9(2).
- Fotopoulos, T., 2005a. The myth of the clash of fundamentalism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1(4).
- Fotopoulos, T., 2005b.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and Inclusive Democracy*.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 Fotopoulos, T., 2007a. Limiting the damage: The elites' new approach to the drug proble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3(3).
- Fotopoulos, T., 2007b. The ecological crisis as part of the present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and inclusive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3(3).
- Gabbard D., & Appleton K. A., The democratic Paideia project: Beginnings of an emancipatory Paideia for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2(1).
- Hardt, M., Negri, A., 1994.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Hardt, M., Negri, A., 2001.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untington, S.P., 1997.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Simon & Schuster.
- Jones, S., 2005. More than half of jails in England are too full. *The Guardian*, 13.
- Luhmann, N.,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rgis, J., 2005. Liberatory ethics, education, Paideia and democracy: Experiences of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2(1).
- Simon, T.W., 1990. Beyond technological things. In: Clark, J. (Eds.), *Renewing the Earth*. London: Greenprint.

责任编辑:胡颖峰